

怎样当好农村干部

王德胜 著

25.15

山西人民出版社

怎样当好农村干部

杜桃荣 郭全盛

B314/53



山西人民出版社

B 031008

怎样当好农村干部

杜桃荣 郭全盛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8 字数: 110千字

1982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900册

书号: 3085·232 定价: 0.45元

目 录

一、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1)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1)
把政策交给群众.....	(4)
政策的变与不变.....	(7)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3)
不唯上不唯书不随风倒.....	(13)
调查研究 掌握实情.....	(16)
千万莫搞“一刀切”.....	(20)
讲真话 走正道.....	(22)
三、学会按规律办事.....	(27)
客观规律违背不得.....	(27)
按经济规律管理经济.....	(31)
信守合同取信于民.....	(36)
一定要注意生态平衡.....	(39)
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44)
遇事同群众商量.....	(44)
尊重自主权和加强党的领导.....	(47)
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	(51)
五、正确对待和运用典型.....	(55)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55)

典型要丰富多姿·····	(58)
不吹、不喂、不娇、不强加于人·····	(60)
六、当科学种田的促进派·····	(65)
科学就是生产力·····	(65)
带头学科学用科学·····	(69)
让科学成为群众的有力武器·····	(72)
七、广开生财之道·····	(77)
发展多种经营·····	(77)
发挥本地优势·····	(81)
要有长远打算·····	(84)
大力支持专业化生产·····	(88)
八、民主与法制·····	(93)
一条根本制度·····	(93)
集体领导 分工负责·····	(96)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99)
搞好民主选举·····	(103)
树立法制观念·····	(107)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110)
九、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带头人·····	(115)
发扬共产主义精神·····	(115)
重视文化建设·····	(119)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23)
带头移风易俗·····	(127)
搞好计划生育·····	(131)
讲究卫生 美化环境·····	(137)
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142)

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142)
思想工作要科学化·····	(146)
关心群众生活·····	(151)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56)
团结就是力量·····	(160)

一、正确执行党的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粮食生产持续增长，多种经营蓬勃发展，农民的生活就象芝麻开花——节节高。社员们高兴地说：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

这话说得实在。这二三年，许多先进队，光景过得更好了。那些长期贫穷落后的队，也很快甩掉“三靠”帽子，改变了面貌。这个深刻的变化告诉我们，要把群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在致富的道路上又快又稳地前进，最要紧的是政策要对头。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这一论断是千真万确的。

建国初期，我们先是实行了土地改革政策，农民分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接着，又“趁热打铁”，按照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方针，引导农民走上了合作化道路。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这一段时间，尽管在政策上有些过快过急的失误，但总的来说各项政策还是正确的。所以，我们非但没有发生苏联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那种生产遭到破坏的现象，而且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

但是，在胜利面前，由于我们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加上经验毕竟还不足，在一九五六年犯了急性病。从这一年

起，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下降，牲畜有所减少。到一九五八年，又搞了一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有些地区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过渡到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盲目地追求“一大二公”，结果刮起了一股“平调风”、“浮夸风”、“共产风”，再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了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党中央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农村颁布了《六十条》，规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允许社员经营家庭副业、种自留地、开展集市贸易等，结果农业生产又很快得到恢复并比较顺利地向前发展。

可是，紧接着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由于对国内的阶级形势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做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又把过去大跃进时期的错误政策重新加以肯定，并且推向了极端：以平均主义代替了按劳分配，以“穷过渡”破坏了三队所有队为基础，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理由取消了社员的自留地、限制了社员的家庭副业，以“一平二调”否定了等价交换，以强迫命令取代了自愿互利……在这一系列左倾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农业发展缓慢，农民群众的生活很少改善，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下降。这一段历史，咱们每一个农村干部都不会忘记的。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全面纠正“十年内乱”的左倾错误，将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继两个农业文件之后，又相继颁发了七十五号文件，发展多种经营文件等。短短的四年时间，我国农业出现了山花烂漫，方兴未艾的大好形势。一九七九年农业生产大丰

收，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一九八〇和一九八一年虽然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只是粮食总产稍次于一九七九年，而农业总产值仍然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五的速度向前发展。一九八二年，又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群众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一九八二年我国农民每人平均纯收入为二百七十元，比一九七八年翻了一番。正象咱们开头讲的，亿万农民热烈拥护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衷心感谢党的富民政策，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显著提高。

有人会问，你说了这半天，那都是中央或上级领导的事，和俺们农村基层干部有啥关系呀？有，不仅有，而且关系很密切。咱们农村干部，不管自觉不自觉，只要实施自己的领导意图，都是在执行一种政策。比方说，有的干部在积极组织社员搞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还积极组织社员发展多种经营、搞好家庭副业、种好自留地，这是正确执行了党的政策。有的干部只顾抓粮食生产，不重视多种经营，这是还没有从过去那种“以粮为纲，全面砍光”的错误政策中解放出来。有的干部虽然也让社员搞家庭副业，可是却规定许多束缚社员手脚的条条框框，这是在搞自己的“土政策”。有的干部随风转，生搬硬套别单位的经验，人家的做法虽然符合党的政策，可是却不适合本单位的情况，结果好事办成了坏事，这是以错误的态度对待党的政策。可见，你只要当干部，就不能不执行某种政策，不是执行正确的政策，便是执行错误的政策，或者是以错误的态度对待正确的政策，把“经”念偏了。而干部是否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以及政策水平如何，都直接影响到工作的好坏。

从以上事实中我们看到，执行什么样的政策，以及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党的正确的政策，这实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正由于此，毛泽东同志谆谆告诫我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是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代表了亿万人民的根本利益。各级领导同志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特别是对日常工作中经常遇到的政策问题，如生产责任制政策，家庭副业、自留地、自留人政策，粮食征购政策，税收政策，林业政策，畜牧业政策，房地产权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不仅要弄懂，而且要熟悉。只有熟悉，运用起来才能得心应手，真正把各项工作做好。

把政策交给群众

有的同志可能要问了，政策是靠干部来掌握执行的，只要干部知道就行了，为什么还要交给群众呢？这个问题提得好。在有些单位，党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工作、生产搞得不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很好地认识 and 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无论是工业、农业、商业，还是文教、卫生、体育，办这些事业的方向、目的是什么，怎样才能办好这些事业，都应当让群众知道。正确的政策，是事物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群众实践经验的总结；它规定了某项事业、某项工

作，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也就是说，政策是指方向，指路子，指规矩的。任何事业只有在正确的政策指导下，才能取得胜利。既然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来办，那么，为什么办这些事情的“方向”、“路子”、“规矩”不告诉群众呢？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让群众懂得党的政策。他反复教导我们，要把政策交给群众，“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事实也确实是这样的。远的咱就不说了，就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几年吧，党中央清算了过去农村政策中的左的错误，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农业到林牧副渔，从生产责任制到社员的家庭副业、自留地，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由于这些政策深得民心，很快便家喻户晓，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力量，在生产中结下了丰硕的果实。比如社员的家庭副业，这几年发展之快，收益之大，是建国以来少见的。还以山西省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为例：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一九八一年比一九七八年增长百分之七十六点五，其中集体分配增长百分之二十五点九，家庭副业增长二点七倍，由十五元增长到五十六元，占到人均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各地还涌现出一批靠家庭副业致富的典型，有的一年要有成千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再比如：党的林权政策放宽后，植树造林马上出现了一个新局面。仅以个人植树为例，一九八〇年，山西省个人植树就达五千三百四十万株，占到当年全省植树总数的五分之一强。象这样的例子，每一个大队、每一个公社都可以举出很多。

让群众知道党的政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对我们干

部实行监督。党的政策是多方面的，客观情况更是错综复杂，我们干部即使学习得再好，也不可能每一项政策都能掌握得恰到好处，更何况有些同志本来就学得较差。因此，让群众了解党的政策，对我们干部实行监督，就能使政策执行的更准确，更稳妥，避免干部犯错误。

那么，怎样才能把政策交给群众呢？首先，要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地把党的政策传达给群众。我们看到，有些干部是很少注意这一条的。就说责任制吧，群众形容他们是“县上开会一本本，回到队里一片片，见了群众一句话——上头让分地哩！”这怎么能行呢？难怪有些地方把“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理解成了分田单干。有些单位虽然也组织群众进行传达，但往往局限于念一念，有些同志甚至出于任务观念，念一遍就拉倒，也不管群众听懂了没有，理解了没有，这实际上等于走了个过场，远远谈不上是交给群众。正确的做法是，不仅要认真真地向群众传达，还要组织群众讨论，逐条逐条地弄懂弄通。

当然，这还仅仅是第一步的工作，要真正做到深入人心，还需在实践中反复宣传，碰到什么问题就宣传什么政策。碰到林权纠纷就宣传林权政策；碰到乱开荒地，就宣传山林土地政策；碰到儿女虐待父母，就宣传尊敬老人，赡养父母的政策……同时，也可以根据各个时期的工作重点，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政策，如秋收分配，就要多讲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道理，多宣传一些按劳分配政策，农副产品收购政策和税收政策等；元旦春节期间，就可以多宣传些家庭、婚姻、计划生育政策，拥军优属政策等；队与队要统一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就可以多宣传些自愿互

利、等价交换政策，等等。在宣传过程中，不要只是就事论事，还要就事论理，根据农民提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给予回答，讲些农民需要知道和容易接受的道理。

这里，值得提请农村干部注意的是，不能扣压党的政策，另搞自己的“土政策”。前些年，我们在这方面曾有过很深的教训。有些同志或是出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或是自己干的某些事情不符合党的政策，便采取错误的做法，把上级的文件扣起来，不向群众传达贯彻。还有的同志只捡对自己有利的宣传，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宣传，这是党的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这些同志以为他们这样做就可以由自己胡折腾了，其实，到头来既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

政策的变与不变

这些年常听有些干部、社员说：“不怕出力干，就怕政策变。”这话反映了广大农村干部和社员的心声。二十多年来，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农村政策有时变得太多、太快，确实把人们变怕了，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了影响。沉痛的教训告诉我们：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各地为贯彻党的政策而制定的一些具体规定和措施），一定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

正确的政策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这首先是由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决定的。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量变的过程中，又包含着若干部分质变。适应这种发展规律，政策就应当有阶段性，就是说在政治或经济生活中，每个发展阶段有每个发展

阶段的政策；在这个阶段内，相应的政策必须稳定，不能随意变更，随意变更就会造成混乱，就要坏事。就以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和规模来说吧。根据我国生产力的性质，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七年，由初级合作社过渡到高级合作社，无疑是适时、正确的。初级合作社时，各农户还保留着土地所有权，耕畜和大农具也仍归原主所有，并要付给他们一定的使用费。这样，一部分人仍可以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部分地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使合作社不能很好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实行高级合作社，就克服了这些缺陷。但集体核算单位的规模，仍然保持初级社时的规模（类似现在的生产队），是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多方面的、综合的、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很短时间内就发生大的突变，因此核算单位的规模也应该相应地稳定，但是这些年来却变来变去。高级社时，不少地方实行了全社核算（相当于现在的生产大队），由于干部管理水平和经验等方面的问题，不少合作社生产受到影响，于是便提出下放“自治权”的问题。该放的还没放，又来了个人民公社化，不少地方的核算单位几乎是一夜之间变成了以公社为单位，结果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于是又往回退，先是退到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结果不行，最后才彻底退回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由于这样的规模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农业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又刮起了所谓“穷过渡”风，直到“四人帮”垮台后，有些地方还在刮。还有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政策、林权政策，也是变来变去。政策每变一次，群众的积极性就受一次影响，生产就受一次损失。确实是“政策不稳，

人心不定；人心不定，生产难上。”这样的教训实在太深刻了。

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调整了农村经济政策，并反复强调稳定不变。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赵紫阳总理还特别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和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长期不变，坚持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长期不变。他说：“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一方面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坚持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另一方面要求摆脱过去管理体制上的集中过多、生产上的瞎指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各种不合理负担。近三年来，我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对农村生产关系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多年来创造的物质技术条件得到更好的利用，农业生产得到又一次解放。”

那么，党的政策是不是就一成不变了呢？也不是。前面我们讲了，在事物发展的一个大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小的质变，形成若干小阶段。随着事物的部分质变，有些政策也是要变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变？变到哪里去？过去多年来，我们是凭主观意志随意变；或者为了“赶”形势，为自己争得一时的荣誉，强行变；或者以自己的口味为标准，拿上政策当儿戏，想怎么变就怎么变；还有的是换一茬干部就变一次政策。这种变，对国家、集体、个人都没有好处。正是针对这种胡变、乱变的情况，党中央提出了稳定政策的主张。那么，我们所说的正确的变又是指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中，在坚持“两个不变”的前提下，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情况，对一些具体政策随时可能做一些

必要的调整，其目的是使我们的政策更符合实际情况，更体现人民群众的要求，更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比如：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在最先颁发的两个农业文件中都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但是，在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一些困难地区自动搞起了包产到户，特别是四川、安徽等地，包产到户的数量越来越多，并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在全国农村引起很大震动。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确认包产到户也是一种责任制形式，尤其是对一些长期解决不了群众温饱的地区，比其它办法更为适宜，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都有好处。于是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中央正式颁发了七十五号文件，明确规定：“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这是第一次变。后来包产到户还在继续发展，逐渐突破了七十五号文件的范围，开始波及到一些中间队，怎么办？党中央又指出：已经搞了包产到户，而群众又满意的，也应稳定下来。这是第二次变。到了一九八二年四月，中央又发出《全国农村工作纪要》，进一步明确规定：“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这可以说是第三次变。但是，责任制的发展到此并没有完结。到了这一年下半年，大包干在全国农村普遍推广，成为大部分地区责任制的主要形式。赵紫阳总理在十一月三十日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又

指出：“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大包干，最初出现在贫困边远地区，很快就扩展到经济水平高的富裕地区。不仅生产落后、经营单一的队采用了，而且经济发达、专业化程度高的队也陆续推广了这种办法，现在已成为大部分地区责任制的主要形式。”“它是现阶段在农村发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形式。我们的任务是要继续稳定、完善和提高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允许存在，在实践中完善、提高。对群众乐意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其它形式，一律不能去堵，应积极支持，帮助解决出现的问题。”从这些发展变化中可以看出，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这一项政策精神是始终没变的，但责任制的具体形式则是在实践中不断改变的。党中央正是不断地总结了群众的实践经验，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创造，又及时作出了新的规定。这种变越来越符合实际，越来越符合群众的意愿，也可以说越变越好了，所以社员们越来越称心，越来越满意。现在人们所说的怕“变”，不是指上面说的这种变，而是怕再变回到三中全会前“左”的老路上去。而这是我们党绝对不能允许的。

在明白了变与不变的道理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变的权力在哪里？事实上经过上面的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比较明确了。凡是明文规定的政策，变的权力在决策单位——党中央、国务院或省、市有关领导部门。其中除了一些基本政策，如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林权、税收等政策外，还包括涉及全局性的具体政策，如自留地的最高数量、社员能不能搞长途贩运、允许不允许购买拖拉机、承包的土地能否转让……都必须由决策单位来决定。我们基层组织只有执行政